

周广仁老师和她的学生 1964 年于中央音乐学院
(左起:黄璐莹 梁美 李汉文 周广仁 黄造渝 张钦才)



一、深厚的师生情缘

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1951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两年,我国青年文工团首次出国到“社会主义大家庭”演出大获成功后,在北京东单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汇报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为独唱节目的伴奏者。当女高音歌唱家神采飞扬地登上舞台,紧随其后的是一位年轻秀丽的姑娘,她身穿一件合身的旗袍,带着真诚的微笑,款步走到钢琴旁,端庄入座。当钢琴声一响,一直喧闹的剧场立即安静下来,那优美的声音、含蓄的热情感染了全场,大家屏住呼吸,心绪完全融入到音乐之中。那是一首三拍子的圆舞曲,钢琴伴奏的弹性衬托的真是棒极了。

当年我 12 岁,学钢琴也小有年头了,平时只是在家听听唱片,很少有机会去听音乐会,那天居然能听到这么清晰美妙的琴声,尤其是弹奏者高雅、亲切、自然的台风,真使我如醉如痴。从此我仰慕着这位令我崇拜的钢琴家——周广仁。

非常幸运的是,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那是十年后,1961 至 1964 年,我在钢琴系周广仁的班上学习,直到本科毕业。1980 年我工作 16 年后,又回到周先生班上进修了一年。更有幸的是,我与周先生同住在一个楼近四十年。近年来,她又

我最敬爱的老师(上)

文 / 黄璐莹

Mr. Zhou Guangren, the Most Respectable Teacher of Mine

是我们“北京钢琴基础教育学会”及“希望杯钢琴比赛”的总顾问,如此,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周先生的直接呵护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周先生的大家风范、渊博学识无时不在教育着我,影响着我,我很惭愧于自己的才疏学浅,在钢琴教学上一直没有太大出息,真是辜负了老师的一片苦心。写到这里,我心里是很激动的,曾有人对我说“你命好,一生中有贵人相助”,我常想,这位贵人就是周先生。

“文革”后,我调到北京师范学院工作,这里学生的钢琴水平较低,时常感到教学意思不大,曾有过两次可以调离的机会,它令我有动心,便去征求周先生的意见,她很肯定地说:“不要动!你就在师范好好干,那里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地方,全国有多少中小學生,你们的工作太重要了。再说,没有一个音乐家、钢琴家不是从中小学走出来的,我是非常尊敬中小学教师的。”周先生还说:“你在工作中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帮忙,只要你把工作做好。”我听了周先生的话,安心坚守在师范大学工作三十余年。2004年由我主持的钢琴课获得“国家精品课”称号。这是首都师范大学建院五十多年来第一个国家级奖项,也是全国高等师范学院艺术类学科及全国高等院校钢琴教学第一个被评为国家级的精品课。周先生曾激动地为我们题词:“向首都师范大学的钢琴老师致敬,感谢你们为我国钢琴事业做出的贡献!”这不是反了吗?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全体钢琴教师由衷感谢周先生几十年来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教诲、支持和帮助。

二、高尚的人格魅力

在周先生 75 岁生日时,她的学生们在贺词中写道:“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什么?最以为荣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是周广仁的学生,您不仅传授给我们丰富的专业知识,您正直、坚韧、宽容、豁达、严谨、谦和的高尚品质,深深地教育着我们。”的确,那正直等 12 个字,决不是一般的形容词,每一个词都能写出周先生一大堆事迹,这是她人格的真实写

照。下面,就我接触到的一些事实,略加记述。

豁达的胸怀

每一位钢琴老师,特别是国家级的权威,谁都想教条件好的学生,以便尽快出好成绩。记得当时附中有几个尖子学生由大学老师教,周先生教被称为小天才的洪昶,周先生非常宠爱他,把自己四号楼宿舍的钥匙都给了他,使他随时可进去练周先生的德国大三角钢琴。而当殷承宗回国准备到钢琴系教一两个学生时,周先生却立即把洪昶转给了他,为的是让殷承宗更快出成绩,难怪殷承宗说:“周先生真是好人,要不谁能开这个口,做出这样的决定。”说真话,如此豁达的心胸,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而对一些专业学习有困难、有问题或是其他老师不愿教的学生,周先生却真诚地接收过来,这才使得像我这样才能平平的学生有可能“挤”进周先生的班上。正当我们得意时,竟看见周先生又收罗进一些“困难户”,便大叫起来:“周先生您怎么要他呀?!”周先生却平静温和地说:“只要肯用功,我都喜欢,我喜欢用功的学生。”周先生对学生一视同仁,决不分三六九等,一位同学曾说:“由于自己业务能力低,几年来一直很压抑,抬不起头来,但到周先生班后,感受到了温暖,学习劲头上来了,性格也开朗多了。”

严谨谦和的作风

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们上大学时,周先生也才三十多岁,在主科教师中她最年轻,很长一段时间,她是钢琴系教研室主任,工作安排得有条有理。每到期末,主科老师都要为学生开总结会,指出优缺点,并要布置经钢琴教研室通过的下学期每个学生的教学计划。每学期除考试外,还要举行多次学习演奏会,时间都安排在晚上,以免影响白天的课,钢琴老师全都要出席。

周先生对系里的老教授们,像易开基、朱工一、洪士 先生都非常尊重,亲自跑前跑后,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使得当时的钢琴系非常团结兴旺,同学们学习劲头十足!连

走廊里放置的破琴,也要抢着“占”,师生在一起相处得是那么融洽,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

80年代初,周先生分配到一套小三居,使用面积才四十多平方米,但当时钢琴系老师的聚会、聚餐(每人带一个菜)都在她家,大家挤坐在她那张罗马尼亚餐桌前,其乐无穷。

以身作则,一丝不苟

周先生的守时是有名的,不论什么活动她从不迟到,这是她对别人的尊重。记得刚开始考级时,提前一天都要先开个评委会,我们总是踩着点才到,可周先生早已在那里张罗了。有两次我早去时,却看见周先生一个人在打扫会议室的卫生,这真使我们感到惭愧。

考级时,有时给我们评委发可乐、雪碧什么的,有一次周先生巡视到我们考场,她看了一眼摆在桌上的饮料,微微皱了一下眉,我明白了,立即将这些“多余物”放进桌子里。从此以后每当我组织各种比赛活动时,都要求评委的桌面干净,以保持赛场的严肃性。我真是从周先生那里学到了一撇一捺。

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周先生为人非常宽厚慷慨,虽然她很少当面说一些热情的话,但在她自然的热情中渗透着友情与关爱。

“文革”时期,我和她都住在4号筒子楼,她住二层,我住三层,我下楼时,她家的事就进入我的眼帘。那时常有一些外地师生来找她上课,她几乎是有求必应,在“文革”时期当然是一分钱学费也不会收的。记得有一位南方的钢琴老师每到假期就来学琴,周先生为了让他省钱,让他每晚打地铺睡在周先生的琴房里,因地方很小,几乎睡在三角钢琴下了,白天还管他吃饭、练琴。当时北京吃饭有定量,发粮票,大米的比例更是少的可怜,后来感动得这位老师从南方背着一袋大米来上课。

搬到“红眼楼”后,已经是80年代了,那时常有专家课或音乐会,对一些家住很远的女老师,周先生经常安排她们晚上睡在自家的长沙发上。一大早周先生自己进琴房楼上课去了,客人则在她家慢慢地喝牛奶、吃面

包,真惬意!有时我们觉得这也太打扰周先生了,她却一摆手说:“哎呀!省得人家跑路,就在这里随便挤挤吧!”

刚开始考级时洪士 老先生也参加,恰好跟我分在一个考场。由于评委需要抄考生姓名,要写评语,还要划勾……洪先生眼花有些忙不过来。周先生当时是总负责人,要巡视各考场。当她发现洪先生有困难时,就坐在他身边,依照他阐述的意见,帮他写评语、记名字,完全像小助教一样。洪先生为能参加这些集体活动很兴奋,看见洪先生高兴,周先生更高兴,她总是为尽可能地照顾别人而快乐着。

有一次谈起为一些老师的著作写“序”、为论文写评语之事,周先生说,只要找我,一般我都答应,如果我写的“评语”能帮人一把,为什么不帮呢?

一次我们听她讲舒曼(周先生是舒曼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在课上她又弹又讲,情绪很激动,当讲到舒曼去世后,舒曼夫人克拉拉请勃拉姆斯一起整理出版舒曼的遗作时,周先生说:“勃拉姆斯当时是音乐学院院长,他爱着克拉拉,为此一生没有结婚。照理说舒曼去世后,勃拉姆斯完全可以追求克拉拉,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和她一起宣传舒曼,所以,舒曼去世后的声望。比他在世时影响大多了。”讲到这里,周先生激动得脸绯红,眼睛里闪着光,她稍停顿,接着就看着我说:“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需要别人扶植,我常想,我的责任就是应更多地帮助钢琴老师们,让他们成功。勃拉姆斯在那个时代能做到,我们今天更应该做到。”这段话我永远铭记。

一次我去邀请周先生参加一个活动,记得是6月份,她本意想答应我。但打开她的记事本(我一看也吓了一跳),几乎每个晚上她都排满了,主要是出席音乐会,有外国专家的,有我国青年教师的,而更多的竟然是一些教师的学生音乐会。由于周先生是学院职称评委,所以一些声乐教师的音乐会、伴奏老师的音乐会,甚至他们学生的音乐会,也都请周先生出席,我说:“周先生您不能这么忙。”她却只

对我笑一笑!

有几次晚上六点多,在楼前看见她挎着小手包,又漂漂亮亮地准备出校门,我都有点急了,说:“您又出去了,忘了你的腿了?”她反而像小学生似的,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喜欢听,我真的很喜欢听。”真没办法呀!

当“红眼楼”要拆,大家都在选择搬新楼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地问她:“周先生,您选哪一套房?”她却坦诚地说:“那么贵,哪来那么多钱呀!”当时我还以为她是一般说说。又一次谈到买房时她说:“新楼太贵,要几十万,旧楼是福利楼,我买旧楼花个两三万就行了。”她现在自己除工资外,没有额外收入,每周公家课(系里)就近二十节,没有精力再教私人学生了,现在手上一个私人学生也没有。她说:“太忙了,保证不了课,会耽误别人的。”听到这些我心里很有感慨,从工资条中,我看到我的工资都比周先生高(我是北京市的),我还有私人学生,有额外收入,而周先生每天为别人忙,收入很少。可是一般人却认为周先生是国外回来的大专家,一定很有钱、很讲究。其实周先生除了比常人更忙外,生活却比常人更简单。她常说:“我只要一小碗米饭,二十分钟的午睡,就够了。”

坚持原则,和蔼可亲

常有人说周先生温和,特好说话,这是公认的,但我却对她充满敬畏。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很怕她,要跟她谈什么事,心里总要哆嗦一下,硬着头皮去。因为周先生很讲原则,是非很分明、很直率。不对的事就不给你面子。有时也会急,脸涨得很红,如果她不同意,总会说“为什么呢?我不这样看……”但她从不挖苦人,不讽刺人,不损人或看不起人,而是真诚地、坦率地对事、对人。

中国“音协”的同志曾说,在各种比赛与考级活动中,钢琴评委的公正及认真是大家公认的,说实话,这也是榜样的力量。一次我到周先生家,看见校内一位老师正在央求她在比赛中多“照顾”某学生,周先生说:“我不能这样做,这是职业道德。”她缓和了一下又

说:“况且这么多评委打分,我一个人的分数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这位老师立即说:“是啊!您是权威,只要您跟这些评委打个招呼,不就齐了吗?而且选手的家长表示了,你们有什么要求,他会做到的。”周先生一下子就急了,声音直发抖地说:“我怎么能这样,我怎么能这样呢?!”

一次我姐姐黄佩莹跟我说,她的一名学生参加全国比赛的决赛,周先生是评委,就坐在黄佩莹身边,姐姐憋了好几次想告诉周先生,“注意”一下她的学生,但最后还是不敢说出口。比赛结束后,周先生无意中问她,那个弹《猫和老鼠》的选手是谁的学生?我姐这才敢说:“是我的。”周先生高兴地说:“不错!不错!”接着又指出一些具体问题。正是周先生的正直、威严,带出了钢琴界好的作风,带出了一支敬业公正的队伍。

无私奉献的楷模

最近我看了央视“大家”栏目,内容是采访周先生的节目。其中有一段,周先生很自责地说:“我对他(去世的丈夫)太不关心了,他身体不好,有胃病,可我从没有陪他去过一次医院,要是在今天我会为他请假的。”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哗哗地流出来。的确,在大学时我跟周先生上课,三年的课都安排在早上八点,她从来没迟到过,从来没请过假,好像她从来不会生病,家中孩子也从来不会生病似的,岂知周先生为了工作,为了学生,为了我国的钢琴事业,真是一不顾己,二不顾家,不会休息,从不肯请假。我们在贺词中写道:“您使我们懂得什么叫奉献,什么叫呕心沥血,您为我国钢琴事业树立了丰碑。”周先生的言传身教是我们这些学生最大的财富,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待续)

